那些靠心灵而伟大的人，从不会因为逆境而沉沦。恰恰相反——

美好的品质常常在逆境中发光

罗曼·罗兰说：“我称为英雄的，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的人；而只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行动者；有的只是些空虚的偶像……”

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一些不屈从于命运、并有力量战胜厄运度过黑暗，并从困境中成长的伟大的人，他们无一不具备伟大的精神和伟大的品格。作家茨威格曾对读者们说：“读伟人的传记吧，与勇敢的心灵作伴！”

这些传记中人的生涯，几乎都是一种长期的受难。或是悲惨的命运，把他们的灵魂在肉体与精神中磨折，在贫穷与疾病的铁砧上锻炼；或是，目击同胞遭受痛苦，内心为之碎裂，他们永远过着磨难的日子；他们固然由于毅力而成为伟大，可是也由于灾患而成为伟大。所以不幸的人啊！切勿过于怨叹，人类中最优秀的和你们同在。汲取他们的勇气做我们的养料罢；倘使我们太弱，就把我们的头枕在他们膝上休息一会罢。他们会安慰我们。在这些神圣的心灵中，有一股清明的力和强烈的慈爱，像激流一般飞涌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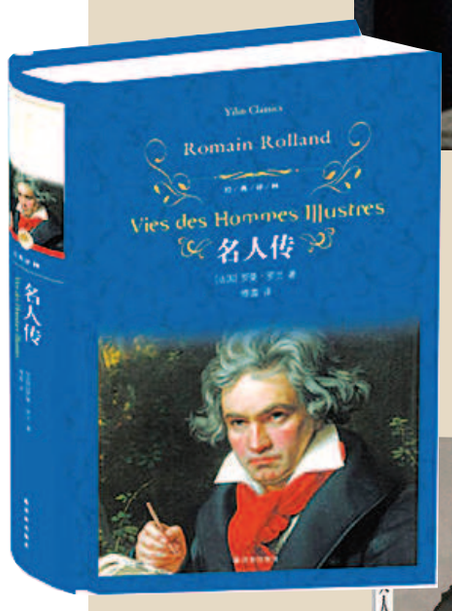
越是身处逆境，越是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都更需要坚忍、奋斗、敢于挑战的大勇主义。

——编者

▲2016年上映的传记电影《居里夫人》讲述了居里夫人1904年到1911年的经历，埋头实验、幼儿降生、丈夫离世——经历人生变故的居里夫人以顽强的意志继续着科学研究

在此英勇的队伍中，我把首席给予坚强与纯洁的贝多芬。他在痛苦中间即曾祝望他的榜样能支持别的受难者，“但愿不幸的人，看到一个与他同样不幸的遭难者，不顾自然的阻碍，竭尽所能地成为一个不愧为人的人，而能藉以自慰。”经过了多少年超人的斗争和努力，克服了他的苦难，完成了他所谓“向可怜的人类吹嘘勇气”的大业之后，这位省里的普罗曼德，回答一个向他提及上帝的朋友时说道：“噢，人啊，你当自助”。

——罗曼·罗兰



◀《名人传》
罗曼·罗兰 著
傅雷 译
译林出版社

▶《居里夫人自传》
玛丽·居里 著
陈筱卿 译
译林出版社

我们自动放弃从发现中所应得的利益，也就等于是放弃了大量财富，但我们并没有考虑这些，倒是一些朋友好心好意地提醒我们说：“如果你们保留本该属于你们的权益的话，早就有足够的财力创建一座设备精良而齐全的镭研所了，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举步维艰。”此话不假，但我仍然坚信皮埃尔与我的行为和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玛丽·居里

贝多芬一七七〇年十二月十六日生于科隆附近的篷恩，一所破旧屋子的阁楼上。他的父亲是一个不聪明而酗酒的男高音歌手。母亲是女仆，一个厨子的女儿。由于母亲的早逝，父亲的无能，他那不幸的童年，很早便担起了家庭现实的重担。

尽管他拥有显露无疑的音乐才华，但令他的生活雪上加霜的是一八一五年秋天起，贝多芬的耳朵完全聋了。关于一八二二年《斐但丽奥》预奏会的经过，有兴特勒的一段惨痛的记述可按。“贝多芬要求亲自指挥最后一次的预奏……从第一幕的二部唱起，显而易见他全没听见台上的歌唱。他把乐曲的进行延缓很多；当乐队跟着他的指挥棒进行时，台上的歌手自顾自的匆匆向前。结果是全局都紊乱了。乐队指挥翁洛夫，不说明什么理由，提议休息一会，贝多芬不安起来，他东张西望，想从不同的脸上猜出症结所在：可大家都默不作声。他突然用命令的口吻呼唤我。我走近时，他把谈话手册授给我，示意我写。我便写：恳求您勿再继续，等回去再告诉您理由。于是他一跃下台；对我嚷道：“快走！”他一口气跑回家里；倒在便榻上，双手捧着脸；用餐时他一言不发，保持着最深刻的痛苦的表情。晚饭以后，当我想告别时，他留着我，表示不愿独自在家。等到我们分手的辰光，他要我陪着去看医生，以耳科出名的……在我和贝多芬的全部交谊中，没有一天可和这十一月里致命的一天相比。他心坎里受了伤，至死不曾忘记这可怕的一幕的印象。”

在这悲苦的深渊里，贝多芬却从事于讴歌欢乐。这是他毕生的计划。从一七九三年他在篷恩时起就有这个念头。他一生要歌唱欢乐，把这歌唱作为他某一大作品的结局。颂歌的形式，以及放在哪一部作品里这些问题，他踌躇了一生。我们应当注意《第九交响乐》的原题，并非今日大家所习用的《合唱交响乐》，而是《以欢乐颂歌的合唱为结局的交响乐》。

这个不幸的人长时间受着忧患磨折，却永远想讴歌“欢乐”之美；年复一年，他延宕着这桩事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日他才完成了心愿。

他的巨著终于战胜了庸俗。维也纳轻浮的风气，被他震撼了，要知道维也纳当时是完全在罗西尼与意大利歌剧的势力之下的。一八二四年五月七日，贝多芬在维也纳举行了《D调弥撒祭乐》和《第九交响乐》的第一次演奏会，获得空前的成功。当贝多芬出场时，受到群众五次鼓掌的欢迎，在此讲究礼节的国家，对皇族的出场，习惯也只用三次的鼓掌礼。因此警察不得不出面干涉。交响乐引起了狂热的骚动，许多人哭起来。

贝多芬在终场后感动得晕了过去；大家把他抬到兴特勒家，他朦朦胧胧地和衣睡着，不饮不食，直到次日早上。可是胜利是暂时的，对贝多芬毫无盈利。音乐会不曾给他挣什么钱。物质生活的窘迫依然如故。他贫病交迫，孤独无依，可是他战胜了——战胜了人类的平庸，战胜了他自己的命运，战胜了他的痛苦。

因此可以说他已达到了终身向往的目标。他已抓住了欢乐，尽管他还得不时堕入往昔的怆痛里去。《第九交响乐》的胜利，似乎在贝多芬心中留下它光荣的标记。以至于史比勒医生于一八二六年看见他，说他气色变得快乐而旺盛了。

然而，死仍悄然而至。一八二六年十一月终，贝多芬躺在弥留的床上，经过了三次手术以后，他在大风雨中，大风雪中，一声响雷中，咽了最后一口气。

亲爱的贝多芬！多少人已颂赞过他艺术上的伟大。但他远不止是音乐家中的第一人，而是近代艺术底最英勇的力。对于一般受苦而奋斗的人，他是最大而最好的朋友。当我们对着世界的劫难感到忧伤时，他会到我们身旁来，安慰那哭泣的人。当我们斗争到疲惫的辰光，到他意志与信仰的海洋中浸润一下，将获得无可言喻的裨益。他分赠我们的是一股勇气，一种奋斗的欢乐，一种感到与神同在的醉意……贝多芬的密友兴特勒曾说：“他抓住了大自然的精神。”——没错：贝多芬是自然界底一股力，一种原始的力和大自然其余的部分接战之下，便产生了荷马史诗般的壮观。

他的一生是个不幸的人，贫穷，残废，孤独，由痛苦造成的人，世界不给他欢乐，他却创造了欢乐来给予世界！

◀2006年上映的传记电影《复制贝多芬》讲述了这位天才音乐家和乐稿抄写员之间的故事

汲取他们的勇气做养料吧！

如果奇迹就是超乎寻常，那么它常常是在对逆境的征服中显现的。塞内加尔还说过一句更为深刻的格言：“真正的伟大，在于以脆弱的凡人之躯而具有神性的不可战胜。”人的美德犹如檀木，只有在激烈的火焰中才会散发最浓郁的芳香。恶劣的品质经常会毫无节制地显露无疑，而美好的品质常常在逆境中熠熠发光。

——培根论逆境

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

正像老人每天走向大海一样，很多人每天也走向与他们的限度斗争的战场，仿佛他们要与命运一比高低似的。他们是人中的强者。

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

人类本身也有自己的限度，但是当人们一再把手伸到限度之外，这个限度就一天一天地扩大了。人类在与限度的斗争中成长。他们把飞船送上太空，他们也用简陋的渔具在加勒比海捕捉巨大的马林鱼。这些事情是同样伟大的。做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的人都是英雄。而那些永远不肯或不能越出自己限度的人是平庸的人。

勇气便是在压力之下展现出的优雅。

——海明威《老人与海》

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这是我十五年来与日俱增的信念。而这一切都由于贝多芬的启示。

——傅雷论贝多芬

一九一四年暑假期间，两个女儿由她们的家庭教师领着，在我之前先离开了巴黎，在布列塔尼海滨度假屋住下了。但坏消息不断传来，不久，德国对法国宣战了。

接下来的历史性事件是大家都知道的。比利时被德国的铁蹄蹂躏了。随即，德军进入乌瓦兹峡谷，直逼巴黎。以防万一，我想方设法把我的实验室所贮存的镭存放到安全的地方去。在返回巴黎时，马恩河战役已经打响。在这次大的战役期间，我和巴黎居民一样，时而为胜利在望而欢欣鼓舞，时而又觉得失败在即而忧愁沮丧。我的两个女儿也毅然决然地回到我的身边。

国家处于危难之中，每个人都应尽可能地为自己的国家分忧解难。我也按照自己的专长，想方设法尽力地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人人皆知，X射线对内科和外科医生检查病情有极大的帮助。尤其是在战争期间，可以用它来检查、确定弹片嵌入体内的确切部位，便于医生开刀取出来。它还可以显示出骨骼和体内器官损伤的情况，战争期间，这种设备挽救了无数伤员的生命，缩短了他们的康复时间，同时也使得不少人减轻了痛苦以及免于落下终身残疾。但战争开始时，军队中所有的医疗部门都没有X射线治疗设备，也没有这方面的技师。

我把各实验室和贮藏室所有的X射线设备集中起来，于一九一四年八九月间建起了几个X射线医疗站，由我训练过的志愿者操作它们。在马恩河战役中，这几个医疗站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在红十字会的协助下，我设计并装备了一辆流动X光透视车，是用一辆普通的敞篷车改装的，把一台设备齐全的X光设备和一台发电机固定在车厢里，利用汽车的发动机带动这台发电机发电，以供应X光设备所需要的电力。这辆流动车到处都可以去，只要哪家医院需要，流动车立即就会赶到。尤其对于急诊的伤病员，这种流动医疗车的作用更大。

每当救护站的医生请求我予以帮助时，我便亲自驾驶它前去支援。战区救护站的人多半不会使用X光设备，我不得不挑选一些合适的人给予详细的讲解。开车前往各个救护站，一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困难。比如，替车子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放，替助手们解决吃住的问题，有时还得替车子找各种零配件等等。由于人手很缺，通常情况下我都亲自驾车。人虽累一些，但可迅速赶到目的地，如交由卫生部门去处置，必然会耽搁时间。

最让我们感动的是，伤员们在我们给他们治疗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强忍着痛苦不哼一声的坚毅精神。几年中，我所见到的那些可怖场面无论哪一次都足以让人憎恶战争。战争期间的这番经历使我对这门医疗检查的新技术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与经验。我觉得应该把这些知识与大家分享，所以我便写了一本小册子——《放射学与战争》。

一九一八年秋，经各方为恢复和平而奔走之后，各国终于签订了停战协定。然而，战争所带来的种种严重破坏，人们仍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职员们和学生们在战后陆续复员，我的实验室工作也逐步走上正轨，但因国家财政困难，想要寻求理想的发展并非易事。幸运的是，一九二一年，我得到了一个弥足珍贵的帮助。W.B.梅乐内夫人在美国发动全国妇女捐款，成立“玛丽·居里基金会”，她们把捐的钱用来买了一克镭送给我作为科学研究之用。梅乐内夫人还邀请我和两个女儿前往美国游览，亲自去接受这个礼物和证书，并且邀请美国总统在白宫亲手把礼物与证书交给我。

……

话虽如此，要完成预期的重大目标，经济方面的问题依然在困扰着我们。在这种种困难面前，我就想到一个根本的问题：一个科学家对科学发现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皮埃尔和我，都一向是拒绝从自己的科学发现中获取任何物质利益的。因此，我们毫无保留地把提取镭的方法立即公之于众。我们没申请专利，也没向利用它来牟利的企业家提出过任何权益方面的要求。正是由我们迅速而详尽地公布了镭复杂而精细的提炼方法，镭工业才得以迅速地发展起来。我们自动放弃从发现中所应得的利益，也就等于是放弃了大量财富，但我们并没有考虑这些，倒是一些朋友好心好意地提醒我们说：“如果你们保留本该属于你们的权益的话，早就有足够的财力创建一座设备精良而齐全的镭研所了，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举步维艰。”此话不假，但我仍然坚信皮埃尔与我的行为和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无疑，人类需要注重自己实利的人，他们拼命工作、谋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与人类的普遍利益并行不悖。但人类毕竟也不可缺少具有理想主义信念的人，我觉得一个完善的社会应为理想主义者的研究经费和个人生活提供必要的保证，让他们无牵无挂地潜心于自己的科学研究事业。

（本版内容由本报记者陈熙涵摘编整理自《名人传·贝多芬传》《居里夫人自传》等）